

吉开将人在广西作铜鼓研究学术讲座

前来广西进行古代铜鼓研究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吉开将人先生,应邀于9月10日在广西博物馆作“关于中越跨境铜鼓的新思考”学术讲座。

吉开先生通过近年来对越南和中国境内出土的近百面古代铜鼓实物标本和铜鼓出土地点的实地考察,从铜鼓形制、花纹装饰、铜鼓铸造工艺以及铜鼓使用痕迹等方面,对中越两国铜鼓作系统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不同以往的看法。

他把黑格尔Ⅰ类鼓(即“石寨山型”和“冷水冲型”)分早、中、晚三期,根据分布范围把中期类型再划分为以越南右钟鼓为代表的西组和以广西桂博337号鼓为代表的东组。这一观点前已在《铜鼓(传统)再编的时代——第一千年纪的越南和南中国》(《东洋文化》第78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8年3月)一文中作过系统的分析。

除了黑格尔Ⅰ类鼓以外,他还对黑格尔Ⅱ类鼓进行研究,着重探讨了越南“芒人鼓”,把它从典型Ⅱ类鼓中划分出来,命名为“类黑格尔Ⅱ类鼓”。又从印模铸造工艺着眼(后详),并参考中国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推断灵山型、北流型铜鼓的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二世纪,下限为九世纪左右。根据分布范围,他将前者命名为黑格尔Ⅱ类西组,后者为黑格尔Ⅱ类东组。

综合以上观点,他说明公元后两千年来铜鼓分布情况的变化轨迹,强调广西地区在铜鼓传统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的作用。公元一、二世纪,在广西出现的黑格尔Ⅰ类中期东组实为Ⅰ类中期西组(即越南“东山铜鼓”中期类型)的发展结果(越南北部→广西)。然而到三、四世纪左右,它在广西境内分化为黑格尔Ⅰ类后期西组和东组(即中国“冷水冲型”中晚期),与此大约同时,再分化为黑格尔Ⅱ类西组和东组(即中国“灵山型”和“北流型”)。然后到了九、十世纪,铜鼓传统又在广西境内重新编组,发展为“遵义型”(广西→贵州)、“西盟型”(广西→泰缅),与此大约同时,在越南北部以广西Ⅱ类鼓传统为基础出现了类黑格尔Ⅱ类鼓(广西→越南北部)。由此可以看出广西地区在第一千纪的铜鼓传统改编时代中的重要地位。

吉开先生探讨以上铜鼓各类型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时,除了造型、花纹等类型上的特点之外,还重视它们铸造工艺上的特点。例如,使用印模工具压印范土而铸造出各种花纹的“冷水冲型”和“北流型”铜鼓的年代,应比未使用印模工艺的“石寨山型”铜鼓晚。吉开先生认为,洪声以来在中国国内流行的“北流型”铜鼓的年代早到公元前的看法有必要修正。

为了补充此观点,吉开先生还对铜鼓鼓面留下的敲击痕迹作了仔细分析。在中国,他观察到在灵山型、北流型铜鼓的大部分标本中,除了鼓面中心太阳纹上的第一敲痕外,在它的旁边还有因多次敲击而留下凹塌而磨灭花纹的第二敲痕,除此两类型之外,只在黑格尔 I 类中期东组(即中国“冷水冲型”中期鼓,例如:桂博 38 号鼓)的几面标本上看到。而在越南,大多数集中于黑格尔 I 类中期西组(即越南“东山铜鼓”中期中型),而其他类型中几乎看不到。在以上主要有第二敲痕的四个类型中,灵山型、北流型、黑格尔 I 类中期东组均是使用印模工艺的,而越南黑格尔 I 类中期西组虽不使用印模工艺,但其年代恰好相当于印模工艺的出现时期。第二敲痕是年代比较相近的一系列铜鼓的特点。因此,采用印模工艺同时带有第二敲痕的灵山型、北流型铜鼓的年代上限,不可能早于黑格尔 I 类中期东组的年代,即公元二世纪。

在讲座中,吉开先生综合与类型学、铸造工艺、以及使用方法有关的观点,在跨越国境线的范围内整理铜鼓两千年来的演变过程。作为此次讲座内容的总结,他最后提出了“铜鼓传统多元一体发展论”的设想。他还强调在二十一世纪的铜鼓研究中,将当年黑格尔未能涉及到的几个问题,如铜鼓各类型分布范围和它的变动轨迹、铸造工艺对花纹和造型的影响、铜鼓生产与“流通”等与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有关的各项问题,能作为铜鼓研究的新课题而作人的探索。

吉开先生的精彩阐述,受到全体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

(申 欣)